

1. 潘多拉的盒子

罗伯特·L·贝特曼第三

我认为，我们正开始进行一场革命。通过它，我们将改变在战斗中指挥士兵和战术分队的方式。

——弗里德里克·弗兰克斯中将

按：我们给“军事革命”所下的定义是：由技术、体制、战术变化或社会、政治及经济因素引起的战争性质的根本改变，部队的发展、部署及作战方式也将因此发生相应变化。目前，人们在预测美国陆军“21世纪部队”和“后天的陆军”的未来时，都把重点放在各个层次的数字化部队在战场上所使用的技术和方法上，也就是把重点放在了战术层次上。似乎技术进步的一个副产品就是战术条令和组织结构也发生了变化。

上述预测忽略了这些变化可能会给在未来战场上作战的男女官兵造成的影响。过去，陆军没有意识到某些技术可能带来的副作用，尤其是忽略了两种技术并用的效果。

本章中谈到了关于人的变化的几个简单方面的问题。通过回顾美国陆军过去在适应变化时失败的经历，我们就能够推断

出将来的不足可能带给我们怎样的教训。技术和其他因素以一种微妙的方式结合起来，可能会产生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后果。当我们把技术和人放在一起，其结果并不总是像我们在实验室里所预期的那样。我们只需稍稍回顾一下军事史，就可以找到这方面的例子。

如果说军事革命真的存在，显然这也不是第一次了。历史学家和军事理论家们认为，技术、体制变化、社会变化或三者的结合改变了打赢战争的方式，与此相关的、主宰军事事务的要素已经经历了 3 到 10 次变化。从 14、15 世纪的步兵革命到核武器的出现，每一次变化都十分明显。在我们这个世纪里也有一个例子，不幸的是也和上述变化差不多。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不仅自动化技术迅速发展（这导致了更好的坦克的出现），通信器材也是如此。在人类历史上，相互看不见的部队之间首次实现了远程即时通信，并在军事组织的各个层次上投入实际应用。一些国家在把无线电技术的进步用于坦克发展的同时，为了追求新的作战方式也建立起了一套强化系统。

在这方面，美国并不是走在前列的国家之一。直到 1940 年，在美国陆军的财政预算中，仍然开列着购买、照料和饲养信鸽的费用。法国也采用了类似的条令，不过不是 1940 年的法国，而是 1918 年的法国。我们的体制在哪里出了问题，又是怎样出了问题的呢？我们有必要找到出问题的地方，这样才能准确地检讨自己，以免将来重蹈复辙。

我们尤其可能会问自己：“我们在作出预测时忽略了些什么？”很多人都声称，数字化将导致战争面貌的巨大变化，那么，保持不变的那些因素又是什么呢？不变的至少有两样东

西：恐惧和指挥。数字化对这些不变的因素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我们的决定所造成的出人意料的后果，可能使我们与预期的最终目标背道而驰。在此之前，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分析这些变化，可能对我们的领导人及其领导方式造成的影响。目前，陆军所关注的是战场指挥，以及规范未来成功指挥官必须具备哪些素质。但是仅仅这样就够了吗？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包括信息处理、信息爆炸对指挥官可能产生的影响、21 世纪部队指挥官的培养等等。我们必须现在就采取行动，以免过后来不及调整。

战争中常见的现象就是恐惧。指挥官的作用就是化解恐惧。所有的战士，或至少是大多数战士都会感到恐惧。无论在哪个年代，恐惧都是一样的。这可以从历史课本和以未来为背景的科幻小说中找到证据。由于各个时代的社会、文化习俗不同，对恐惧做出的反应也不一样。但是恐惧产生的原因对所有人来说毫无二致：当生命受到威胁时，人类就会做出某种生理反应。

军队通过强化训练来减轻恐惧感，通过加强指挥来降低恐惧感，却无法做到既使人体不受到任何刺激，又能消除恐惧。一般来说，这是不现实的。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形成了“纪律”的观念。所谓纪律，就是把个人的真实意愿置于组织目标的约束之下。

目前，我们的纪律约束手段和要求层次实际上是针对一个“空的战场”而制定的。以往的纪律，甚至直到 150 年前，都被认为是极端的、过时的。当时的战术出于同样的原因已经遭到淘汰。在线性战争的年代里，纪律是为了让战士们敢于面对战场上对其勇气的强大的心理冲击而不退却。过去，人们总是

能看到士兵生命受到威胁的情景。

在 20 世纪，我们已经习惯于“空的战场”的现象。在这个世纪里的大多数时候，士兵们是在开阔的战场上打仗的。一旦枪声响起来，单兵的世界就被压缩成一小片，实际上通常只是他或她卧倒在地时眼前所看到的那一小块地方。在战斗中可能会看到几个战友或者几个敌人，但在大多数时间里，除了武器装备别无其他。如果真实的或人造的战场不再是“空的”，将会怎样？“冲击”这个老掉牙的（但直到现在也没有经过界定的）概念会不会重返战场？

有鉴于此，我们应该意识到，还有一样东西也是不会改变的，那就是“变化”本身。每当我们在一项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影响中挣扎时，怎样才能保持一支先进的部队？不可否认，目前的体系本来应该是能够适应和吸纳变化的，但这个体系适应变化的速度却比当前变化发生的速度慢得多。与技术变化的速度相比，今天美国陆军审议条令并进行体制调整的进程，简直可以说是停滞不前。

如果我们暂且接受“技术是改变战争的起因”的说法，我们就必须通过调整部队结构来保持优势。但无论如何，我们的财力不允许我们每 3 年对整个陆军更新一次。这就是说，考虑到财政方面的限制，我们应该审慎地建立起某种列入编制序列的系统，由它来保证无论何时我们都至少有一部分部队是最现代化的。这个问题可以留给您来做个评判。

最终，一切问题还是要回到条令问题上来。条令就是一整套大家认可的、关于战争的声明或信仰。它是制定条令的军队所在国家的历史、技术与文化的集合。由于是上述因素的产物，条令也成为筛选人们对这些因素的观点的过滤器。一部军队条令一旦施行，可能会改变军队机构内部的文化。条令也可

能会对物资和技术的选择、发展与采购产生深刻的影响。最后，条令还可能影响到一个军事单位对军事历史的态度。

然而，这并不是一个丝毫不受外界影响的系统，尽管最初看上去似乎是这样。为军队提供保障的地方社会可能出于自身的需要开发出新的技术。这种技术有可能对战场产生影响，因此军队不得不对它引起重视。与此相似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他国家军队的作战经验也会成为军事历史新的源泉。最后，军队及为其提供保障的地方社会也可能产生哲学或文化上的变化，从而引起条令的改变。

今天，我们又一次意识到，针对某个特定的战区制定条令，远比在一片空白中编制条令容易得多。在 20 世纪即将过去的时候，我们发现自己的处境有几分熟悉：我们面对的是不断缩减的预算，老百姓看不到有什么威胁的存在，以及技术爆炸。技术在短短几年时间里成倍地增长，使我们无力购买新技术产品。美国陆军正挣扎着寻找自己的位置。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分析一下我们目前的状况，也许有助于现在和未来的军队领导人，回避那些曾困扰着其前任的问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陆军面对的条件与我们今天在整个陆军中看到的十分相像。根据美国的传统，国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对陆军大幅裁员，即便是承诺调拨给相应部队的资金也没有到位。与此同时，通信与自动化技术在地方社会中迅速扩散。

最后，到 20 世纪 30 年代的最后几年，陆军已经找不到对国家安全的像样的威胁。现代化成为陆军的目标，“少花钱、多办事”成为当时的口号。由于没有足够的资金既保证军队达到国家的安全需要，同时又进行现代化建设，因此必须做出选择。有些选择导致了人们不希望看到的后果；有些选择是军队

惰性的结果；还有一些选择根本就是错误的。

本来，指出条令或技术上的缺点对军队是有益的，这是各单位本应发挥的作用。不幸的是，我们至少能找到这样几个例子：某些抱着“不惜一切代价打胜仗”思想的军官的行为，恰恰损害了这些单位的作用。在这里，“胜负”是从个人、而不是从整个军队的角度来衡量的。

由于所有这些因素，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美国陆军，只能是技术落后，条令陈旧，“走捷径”的习惯风行。事实上，那时候科特尼·马森格尔们很多，而山姆·达蒙却没有几个。^①

条令是一支职业军队根据其历史的理解而制定的。在各军种的院校里，军事历史课是为了让人们从以前的战争中吸取教训而开设的。人们通过借鉴这些教训为武装部队制定条令，并保证条令的正确性。^②从拿破仑时代起，西方国家的军队就一直是这样做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人通过一套全面、审慎而有组织的程序改变了其条令，结果实现了一些构思精妙、有机统一的战术变化。^③同盟国的审议体系既导致了技

① 安东·麦尔，《曾为雄鹰》（纽约：霍特，瑞哈特和温斯顿出版社，1968年出版；重印版，卡莱索，宾西法尼亚州：陆军战争学院基金出版社，1996年）。这部历史小说的主角名叫山姆·达蒙，一位工作勤奋的、无私的职业军官。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一个自私自利而又无情的“检票员”，同时也是个业余的艺术爱好者、一个要求严格的人，名叫科特尼·马森格尔。尽管这只是一部小说，很多职业军官却将它奉为军事题材的经典之作。美国陆军的军官们非常看重这部作品，陆军战争学院自行重印了这本书就是有力的证明。

② 阿兰·R·米勒，《美国军事史》，见《军事历史与军事专业》，大卫·查特里斯、马克·米尔那和J·布兰特·威尔逊编辑（西点，康涅狄格州：普瑞哲出版社，1992年），第5至9页。米勒在本文中指出，至少有5种军事历史。其中一种就是军事功利主义的历史，也就是说，军事单位为了达到某种特定的目的而故意采用的历史。米勒举出的此类目的之一是这种历史在军队条令的形成过程中能够发挥的作用。米勒在描述军事历史在利文沃斯堡的美国指挥与参谋学校中的作用时指出，“军事历史使军官群体中的作战条令和战略眼光得以发展。”

③ 帝莫西·T·鲁普弗，《条令的活力：德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战术条令的变化》，利文沃斯论文集，第4集（利文沃斯，堪萨斯州：战斗研究所出版，1981年），第八卷。鲁普弗写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德国陆军，在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东线和西线的战事后，刻意地、系统地发展、完善并实施了一系列的条令变化。

术手段的变化，也导致了条令的变化，但两者的原动力却是一样的，那就是西线的僵持和杀戮。

这一过程在战争结束后应当继续进行下去。人们为了总结教训，把部队的作战历史记录下来，仔细研究。然后，军队可以对照这些教训，完善其对于战争的认识。从战斗中得出的教训要么证明目前的条令是可行的，要么则相反。条令一旦制定出来，就成为部队训练的指针；同时也是确定部队技术需求的指导原则。这以后，训练和试验（以及对外国军队发展的观察）又为这个循环提供了新的资源。这个系统正常运转起来以后，就能够确保部队根据时代的发展不断进行完善和变化。但是，有时候这个系统却没能正确地运转。

美国陆军无线电技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恰好说明了技术与条令关系。1920年5月18日，陆军部第29号命令中写道：“步兵部队将安装、保养和使用该步兵旅辖区内的所有通讯线路。”在今天看来，这条命令无论从哪方面来说也并没有什么不正常或不合理之处。但现在是20世纪末，当时却是本世纪初期。

不要说当时一般的步兵战士技术知识贫乏，即使是一般的教育水平也不高。如果放在今天，这条命令等于是要求步兵战士自己把原器件组装成电脑并安装软件；自己解决不同软件运行时不兼容的问题；自己建立起无线网络；并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操作500兆的奔腾II电脑，而且，这一切还要在不耗费资源、不经过在外培训的情况下完成。

当本地培训的步兵替代了经过特殊的统一训练的通信兵后，毫不奇怪，问题马上就来了。这一方面是因为在1920年前后，步兵旅装备的无线电台寥寥无几。1920年国防法案实行时，排、连、营级部队中都还没有无线电，只是在团和旅里

有几部电台。

截止 1922 年，营级部队中装备了新型的无线电设备（这最初是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设计的，直到此时才装备部队）；往下一直到排，都采用了技术（相对于人工和信鸽而言）通信手段。

截止 1924 年，人们开始测试新的设备，并开始训练操作人员。在健康的、富于创造性的体制下，技术对现有条令的影响将在训练中得到承认。遗憾地是，当时美国陆军并没有这样一种体制。

1922 年新开发并投入使用的无线电设备是 SCR - 77 型电台。由于下面两个因素，电台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训练中没能得到成功的运用。首先是因为使用者的态度。几名勇敢的军官在《步兵杂志》上公开撰文表示，他们的同事没有认识到通信的重要性，也没有认识到装备无线电设备的重要意义。

步兵军官在进行机动训练时常常避免使用通信系统，因此，无线电设备存在的问题被掩盖了起来。步兵指挥员认为，机动是为了实际调动和训练战斗中的人。这是训练中最重要方面，所有其他方面都处于从属地位。如果因为不能建立通信联系而无法进行机动，那么“真正的”训练就不能进行，专业发展就会受到影响。当然，这种回避态度制约了训练演习的效果，因为其中的机动训练缺少逼真性。

为了减轻他们忽视无线电通信造成的后果，司令部定期向部队透露一些即将进行的机动演习中的细节，或者允许部队在战斗中不可能具备的条件下打仗。前线步兵指挥员的态度使情况变得更糟。他们不仅无视无线电的使用，而且反对在通信上“浪费”兵力。他们相信还有比这更重要的步兵训练要进行。

1927 年 9 月的《步兵杂志》上有一篇文章就反映了这种

观点。作者在观摩了第 2 师的夏季机动训练后写道：

“通常，步兵旅装备的无线电是没有用的。无线电设备精密，操作人员需要太多的时间才能熟练掌握。而所有的信息都必须加密、解密，这使得无线电根本不能适应实际需要，因为人们总能找到更快、更好的通信方法。目前，无线电不过是一种昂贵的玩具罢了。步兵和通信学校应对它进一步进行试验，因为几年之后，目前的这些重大缺陷可能不复存在。同时，部队不应背上无线电设备保养的包袱，无线电通讯人员应该去做其他的工作。”

这段引言中所指的无线电设备指的是目前技术上已经落伍、但仍然可以使用的 SCR - 77 型电台。看看《步兵杂志》中所反映的这种普遍的消极态度，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从 1917 至 1941 年间总共只有 2 种战术无线电系统装备部队。

上文中提到了 SCR - 77 型电台的脆弱性。对此，简单的技术解决办法是用较强的、经过电容器处理的电波取代单一的、微弱的电波。电波较弱的电台容易受到干扰而导致失灵。（这时候，晶体控制频率或频率模拟还没有出现。然而，人们却没有认识到这种简单的解决办法。过了将近 10 年，这一问题仍然没有得到纠正。这说明，步兵条令对战术通信的局限使通信沦为从属的地位。）

上文中的另一部分总结了当时陆军的普遍想法：“总能找到更快、更好的通信方法。”这里所说的方法指的是地线、奔跑的通信兵和信鸽，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通信系统。就一次平常的机动训练来说，上文作者的说法并没有错。但是，在他所观摩的机动训练中，并没有一个人在敌军的炮火或机枪下丧生。

如果步兵对无线电真的有兴趣，并且在机动训练中像在实

战中那样使无线电发挥重要的作用，我们就可能像其他国家一样，早一点发现无线电设备的技术难关，并努力克服它。然而，步兵条令只适用于以步兵速度缓慢机动的战场，不过是强化了原有的偏见。如果允许步兵控制训练场并降低实战环境的难度，步兵就永远也无法认识到装配可靠的、可移动电台的必要性。

至此，从历史到条令到技术再到新的历史（从训练中吸取了教训）完成了一次完整的循环。第一次世界大战使部队获得了实战经验。当时，1920 年的国防法案和 1923 年的野战勤务条例，确定了以步兵为基础的编制体制和条令。根据该条令，陆军使用现有装备进行训练。

因为总有办法回避无线电的问题，步兵在改进无线电设备方面很少感到或完全没有压力。没有更轻型和更可靠的无线电台，就没有理由尝试发展新的机动形式，也想不到可以更迅速地进行机动。于是，当时的训练只能证明：旧的体制是适用的。

其他部队单位虽然注意到了可移动通信设备的使用情况，可是它们既缺乏政治力量，也没有敦促通信部队发展无线电的明确的需求。结果，无线电的发展陷入了停顿。

在这样的体制下经过了 20 年，其结果可以在詹姆斯·威尔麦斯写于 1940 年的一篇文章中反映出来。威尔麦斯是一个勇敢的步兵中尉、坦克排排长。

发动机缺乏掩护，通讯线路也没有联接在一起，这使得移动的战车和坦克之间实际上还不能进行无线电通讯（更不用说有几次，我们花了几个星期用测微计、计算尺、弗里斯计量器等检查了每一处联接点后，两辆坦克在行进中只进行了几分钟的通信，然后其中一辆轧到了口香糖的一张包装纸，通信就停

止了)。坦克实际上是个聋子，虽然理论上并非如此。

威尔麦斯进一步指出，美国是当时世界各主要军事强国中惟一试图把坦克和信鸽并用的国家。如果当初美国陆军采取不完全依赖步兵的机动式作战模式，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段时间里发展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美国所有的坦克上都装配有无线电台，但正如威尔麦斯所说的，它们没有发挥出作用。

1941年，步兵司令在他的最后一份报告中写道，直到1937年，“通信联系的发展仍然落后于地方。”这个说法并没有完全反映出实际情况。最后，步兵只是引进了各州地方警察曾使用过的调频电台，才使步兵、乃至整个陆军从大战之间的体制当中解脱出来。1941年，陆军引进了SCR-293电台并装备部队。这种电台只是直接照搬当时康涅迪格州警察所使用的电台的样子。这些没有经过改装的电台被装配在装甲车上，马上就在1942年北非的战斗中用上了。这个例子说明，陆军领导人也曾做过一些令人难忘的好事。

在这个例子中，部门利益破坏了现代化的进程。当一支军队有意或无意地发展一个系统时，各个战斗部门却出于狭隘的观念破坏了它。各单位的“领地”凸显了出来，各方互相猜忌，努力保护自己的地盘，以便把各单位财政来源可能受到的影响降到最低。在这种不太健康的环境里，被贴上“反对者”的标签可不是那么好受的。

此外，人们坚信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神话，也就是美国步兵永远勇往直前的神话。这个神话是出于政治原因被创造出来的，为了保持名誉，美国远征部队一直维护着它。并且，无论这个神话在战场上是否得到验证，它被纳入了条令。

因为这个神话，以往战争中采用的体制被认为是足够好的，没必要为了配合新技术的使用而改变条令，特别是，战争

的强度也没有多么明显的改变。步兵部队一直坚持着这个神话和步兵至上的条令。渐渐地，认为未来战争的面貌可能发生重大改变的军官们被斥责和排挤为极端主义者。

来自历史的智慧

这就是两次大战之间美国陆军坚守的立场。坦克只是用来对步兵进行支援的，必须按照步兵的速度行进。有一些轻型坦克装备在骑兵中，出于政治原因它们也被称为“战车”。它们的使用只是有限的，但人们对于利用无线电台进行指挥和控制的潜力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然而，在上述两种情况下，虽然人们认为把坦克和无线电台结合起来是有用的，却并没有感到改进电台并装备部队的紧迫感。

尽管那段时间的专业期刊上偶尔会刊出几篇前瞻性的文章，真正的争论却没有出现。当时，一些专业人士看到了这项技术使作战功效大增的潜力，却没有人倾听他们的声音。那些建议“陆军有必要改变作战体系”的人被撇在一边，就像大智大慧的弥赛亚对一个小小的观点不屑一顾似的，他们的意见被轻易地忽略了。

结果，从 1923 年到 1940 年，美国陆军只奉行一个条令，那就是 1923 年的野战勤务条例。尽管大量的技术变化有可能使战争强度和战争方式发生巨大的变化，美国陆军仍然坚守自己的立场。只有当技术在某些有限的范围内使用时，人们才会不时地关注一下。因此，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没能够将技术与战术充分结合起来。

然而，今天看起来问题出在另一边。几乎所有的人都同意，将会发生重大的变化，技术的发展及其在战场上的应用将

促进这些变化。每天，我们都在对技术与战术条令的种种结合进行试验。所以，我们似乎已经走出了困境。看起来，我们好像正在系统地探索新技术应用于战场时其各种不同结合方式的潜力。那么，我们是否还漏掉了些什么呢？

我们所漏掉的、需要全面探讨的问题就是，个人或有组织的群体与新技术之间将如何相互影响；人与人之间又是如何利用新技术进行互动的。

战场的数字化将使进行机动的指挥官们在战术、战役和战略层次上具备前所未有的认识自身的能力。与此同时，我们也正在不断努力，试图突破信息通道，这些通道正是我们了解敌情的渠道。有了正确的硬件组合和通信设施，这些变化就可能使每个人看到并了解到己军的信息以及有关敌军情况的数据。现在的问题是，该如何处理这些信息，我们已经证实，其中有些信息未来将产生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后果。

正如托弗勒夫妇在他们的著作《第三次浪潮》和《反战争战》中所设想的那样，我们即将步入一个新型的社会和一种新型的战争。信息化社会和信息作战方式，主要依赖通信技术在寻的过程中的充分运用。

然而，除非我们认真避免其发生，信息爆炸可能至少会使一个层次的指挥大打折扣，并最终削弱我们的指挥艺术培养体系。我们最终看到的也许并不是预期的结果，指挥官与信息相结合非但没有实现使部队富有生气、果断、杀伤力强的目标，反而可能会削弱我们的部队，没有经过接受大量信息的训练的、优柔寡断的指挥员可能会被信息吞没。

数字领导

“机动作战”中的“机动”一词指的是一种完整的作战样式，其特点不仅是根据敌情调动部队以占据优势位置，而是更加强调比敌人运动得更快，以超出对手的速度来击败敌人。

战斗指挥原则：一名指挥官在战场上下的成功取决于他根据以下九条基本原则行动的能力，即：主动、灵敏、纵深、协同、多能、弹性、判断、直觉和想象。

“任务战术”是由四个基本要素组成的：服从、熟练、独立行动和自信。四个要素俱备，才能称为任务战术。

战场是一个充满了欺诈、恐惧和迷惑的、不可捉摸的地方，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少不了大量的混乱场面。大部分军事理论都对战场环境进行了仔细研究，并试图理解我们如何才能减轻上述一个或全部因素。军事理论往往导致军队条令的产生，在一个完美的世界里，这将使我们的观点统一起来。

然而这个世界并不完美。

战场上军事领导的互动关系十分复杂；一国可能面对各种不同的战略选择；从一种战略转而采取另一种战略需要经过一定的程序。我们在描述和理解这种转变时所使用的术语令人迷惑，有时还自相矛盾。因此，在本章中使用了一些超出一般意义的定义，以保证读者能够按照作者的原意理解它们。

各国及其军队可以采用的战略有 3 种，它们是：消耗、歼灭和疲惫。前两种战略的目标是摧毁敌军的战斗力，基本上两者的区别不大。第三种战略，力求消磨敌人的意志或资源。这三种战略都是有效的。但由于美国一向偏好迅速而果断的行动，一般美国倾向于采用歼灭战略。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美国必须在战役或战术层次上采取以下两个方法中的一个：可以通过机动、也可以通过实际消灭敌军来达到歼灭的目的（有时候被称作“通过消耗实现歼灭”，这个说法令人有些糊涂）。总体来说，美军地面部队声称他们在战役和战术层次上倾向于采取机动而不是消耗行动。这就使得他们在战术层次上进行指挥和控制时一定会偏好某种特别的风格和方式。^①

不同的军事理论家都对这些方法进行了解释。我们在此将使用英国人描述概念的术语，它们可能来自于 19 世纪的普鲁士人。这两种相互竞争的概念分别叫做“命令战术”和“任务命令”。^②

命令战术要求有一套严格的指挥结构，要求部下对核心计划和控制体系完全服从。这样的战术适于对部队实行自上而下的控制和集中控制。

任务命令强调部下的主观能动性，下属只要服从上级指挥官部署的大致意图即可。^③ 当情况不断变化时，后方的形势图不一定能很好地反映出前线的真实情况。这样的战术正适用于这种不断变化的情况。实施任务命令（也称作任务战术）需要

① 精确制导弹药显然是成功的。由此引起的条令的逐渐变化可能会改变这种特定的喜好。在《陆军 2010 年构想》中，陆军参谋长指出，“制敌机动”将是陆军发展的一个关键目标。然而，在这份文件当中，“制敌机动”的定义是“效果的集合，而不是部队的集合。”这再次引发了关于“要火力优势，还是要地面机动部队”的争论。但是，由于本章中把指挥与控制看作是一个独立的问题，关于被指挥、被控制的对象的定义有几分学术性的味道。

② 德语中把这些概念称作“befehlestaktik”和“auftragstaktik”（字面翻译的意思就是“任务战术”）。这些概念直接来源于普鲁士将军赫尔姆斯·冯·莫德克的作品和影响，以及更早一些的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

③ 赫尔姆斯·冯·莫德克，《战斗，战斗中的领导》，《莫德克谈战争艺术》，丹尼尔·J·休斯编辑（诺瓦托，加利福尼亚州：普莱西迪约出版社，1993 年），第 123 至 133 页。一句引文中说：“鉴于目前战场范围的扩展，在战斗时只能大体上实现对部队的统一指挥。军指挥员、甚至师指挥员都必须根据总体意图，自己对形势作出判断并能够独立采取行动。”

一整套鼓励独立思考者、果断的指挥员和敢于冒险者的思想理论和内在的价值体系。很多人都说，任务命令是以机动为基础的战争的致胜关键。

战争系统（机动相对于摧毁）以及成功地运行它所必须的指挥程序（任务命令相对于命令战术）之间的联系早已确立起来，这在历史中有很好的例子可以证明。但是，所有这些都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在任何时候，下级指挥员都比上级指挥员更了解当地的战术情况。

在工业时代的战争中，从来没有哪种技术能使离前线更远的指挥员更好地观察战场情况。他们可能获得更大范围内的情况，但同时，其接受信息的准确度与信息经过的“过滤器”（即“分析员”）的个数以及数据传输的时间（即“报告”）正好成反比：信息所经过的处理程序越多，从前线向上级传达所用的时间越长，其准确性就越低。

因此，即使是在现代化的时代，机动战争指挥员也总是倾向于把关键的指挥位置设在更靠近前线的地方，最好是能够亲自观察战斗情况的位置，并从那里下达能够左右战斗进程的命令。

本世纪通信技术的进步把更高层次的指挥员从静止的位置上解放出来，使他们置身于战场上，并且能够对位于另一处的部队下达命令。一直在前线上实施指挥的指挥员的能力也因此得到了提高。由于有了无线电台，在前线上或靠近前线作战的指挥员就具备了更大的灵活性，使他们能够把更多的部队或者其他部队的战斗效果（例如，分散在四处的野战炮兵部队的火力）调集到战场的关键点上来。

这种作战与指挥风格的最根本的例子恐怕还是“沙漠之狐”隆美尔本身（尽管我本人更愿意以穿越法国的美军第4装

甲师师长 P·伍兹为例)。不管在哪种情况下,即使叫法不同,观点却是一样的。我们需要通过任务命令,从条令的高度教育指挥员,要为了一个共同的大目标实施机动作战。我们都认为,更靠近前线的指挥员比任何一位没有身临其境的上级指挥官更了解现实情况,一般来说这也没错。

这就是说,所有参与行动的人都充分认识到,一旦情况不像预期的那么好,前线指挥员拥有修改计划的最终权力,并采用他或她认为合适的途径实现上级指挥员的意图。命令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下达的。任务与指挥员意图才是压倒一切的考虑,其他所有事情不过是达到目标的手段罢了。

因为我们假定,即使只能看到前面不远处情况,只有最下层的指挥员才能透过“战争迷雾”进行观察,因此,赋予基层指挥员更大的权力,并依靠他们作出判断是极其重要的。^①指挥员的级别越低,他或她就能够更清楚地看到各个下属部队的实力与位置,知道最近的威胁是什么,因此较低级别的指挥员具有进行决策的更为有利的条件。

如果较高级别的指挥员希望对战斗施加影响,他也必须向前线的方向移动,并找到一处他或她能够亲自观察行动情况及其结果的位置。但是,如果我们给这位较高级别的指挥员提供一些手段,使他或她比处于最前沿的指挥员更好地了解自己的部队以及敌军在那座人人都看得到的山上的情况,又会怎么样呢?

^① “战争迷雾”的概念一直贯穿于军事历史当中。这一术语是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在其著作《战争论》中率先使用的。“战争是不定因素的王国。作为战争中的行动基础的因素中,有 3/4 被或浓或淡的不定因素的迷雾包裹着。”选自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索引版,迈克尔·哈佛和彼得·帕里翻译并编辑(普林斯顿,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6年),第101页。